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1)上



编者的话

古今中外的史籍浩繁。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来说，要熟悉和了解这么多中外历史显然是有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运用史籍中的丰富材料，分别选取了影响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较为重要的和著名的 100 件大事，并用通俗的现代语言编写、整理出一套浅近的、比较有系统的历史读物，以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需要。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过：“读史可以明智。”作为当代的青少年，应该读一点中国历史，也应该读一点世界历史。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启发智慧，而且还可以培养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这套丛书基本上是按历史顺序编写的，涉及的时间从远古至近代（包括当代）。由于是用叙事的形式来讲述历史事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里讲述的每件历史故事，只反映事件或人物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不能凭它来对某一事件或者人物作全面的评价。因此，《世界五千年》可以作为一种学习历史的辅助读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这套丛书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编者

1996 年 8 月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开神州文化之先河——炎黄文化的起源

人类是怎么产生的？人类生活的地球是怎样形成的？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是很普通的常识了，但这些问题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却是当时人类知识水平所无法解释的。大家都知道，在一个问题没有确切的解答之前，人们会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些假说来解释。这些假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修正、补充便成了一个又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神话和传说。这些解释虽然有些荒诞，但也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状况。所以我们要了解历史不妨从这些传说开始。

对于天地万物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解释，西方人认为天地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不知道是西方人词汇贫乏还是太讲究效率，《圣经》里上帝只工作了一个星期，世界就从无到有了。相比之下，我们祖先的解释就精彩多了，这一过程也就复杂和漫长多了。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天，没有地，到处是混沌的一片，既分不清上下左右，也弄不明白东西南北，简直就像是一个浑圆的鸡蛋。大家知道，鸡蛋的中心有一个蛋黄，这个浑圆的东西也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人类的始祖，他的名字叫做盘古氏。盘古氏在这个浑圆的东西中间孕育了1.8万年，就像孵小鸡一样，终于有一天，他破壳而出，拿着自己制造的巨斧左一下、右一下用力地劈着，只听轰隆一声，终于劈开了这个混沌的圆东西。

这个浑圆的东西经盘古氏一劈开，立刻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轻而清，另一部分重而浊。轻而清的那部分不断地往上升，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越升越高，逐渐形成了高高的蓝天；重而浊的那部分不断地往下降，就像是徐徐下落的降落伞一般，越落越低，逐渐形成了广阔无垠的大地。盘古氏也一天天地长大，终于长成了一个高大无比、魁梧健壮的男子汉。从盘古氏开天辟地到天地的最后形成，这中间又经历了1.8万年之久。

盘古氏开天辟地以后，天地间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有时候高兴，有时候生气，有时候伤心，有时候叹气。因为天地是他开辟的，所以天地就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发生种种的变化。盘古氏高兴的时候，天空是晴朗的，万里无云；盘古氏生气的时候，天空是阴沉的，乌云翻滚；盘古氏伤心哭泣的时候，淅淅沥沥的泪水就像是一阵阵的大雨向大地倾泻而下，雨水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江河湖海；盘古氏忧郁叹息的时候，嘴里喷出来的气变成了阵阵狂风，吹得大地上，飞沙走石，形成了一个的沙丘小坡。盘古氏眨眨眼，天空就出现道道闪电；盘古氏睡觉时发出的阵阵鼾声，就是天空中的隆隆雷鸣。

盘古氏的寿命非常非常长，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以后，他终于死去了，头朝东脚朝西平躺在他开辟的广阔的大地上。他的头部高高隆起，就形成了现在山东省境内气势雄伟的东岳泰山；他的两脚脚趾朝上，就变成了现在陕西省境内群峰起伏的西岳华山；他的肚子高高挺起，变成了现在河南省境内风景秀丽的中岳嵩山；他的左臂伸向南边，形成了现在湖南省境内重峦叠嶂的南岳衡山；他的右臂伸向北边，变成了现在山西省境内气象万千的北岳恒山。他的左眼，变成了光辉夺目的太阳；右眼，变成了一轮美丽的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空密密麻麻的星辰。他的肌肉变成了肥沃的土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洁白的玉石和地下无穷的宝藏。他皮肤上的汗毛，变成

了布满大地的树木和花草。

总之，一个丰富多采、光华美丽的世界就这样诞生了。

从这个古老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需要一个绝对的神，而东方人的神却都是由人转变而来的。

从这传说中我们还可看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从盘古是男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祖先是先解决了人类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才解决天地万物的形成的。因为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妇女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采集食物、生养子女、料理家务、安排生活等工作主要由妇女来担任。男子主要是外出打猎，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制造较先进的工具，外出狩猎往往是空手而归，生活游移不定，所以生活往往依赖于妇女。而且，那时不像现在这样的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当时子女只认得自己的母亲，不认得自己的父亲，所以孩子们也往往依赖、信任自己的母亲，形成了妇女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这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的始祖女娲是女性，就说明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祖先便对人类的形成有了一个基本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提高，男人变得越来越重要。弓箭及其它工具的产生使狩猎的收获越来越多，种植技术的出现使男人们耕种的土地变成了人类食物的稳定来源，这样男人的地位日渐提高，人类步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从盘古是男人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天地万物的形成这一问题直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才有了为多数人认可的答案。

传说终究是人们凭想象编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史书是怎样解释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的。

中国古代第一部较完备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当时人们认为除了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民族外，还有北方的狄、南方的蛮、西方的戎、东方的夷。关于蛮夷戎狄的起源，司马迁认为，在尧舜时期由于共工、兜、三苗、鲧犯了罪，于是舜向尧建议，把他们流放到偏僻的地方，尧采纳了这个建议。共工被流放到幽陵，他的后代就是北狄；兜被流放到崇山，他的后代成了南蛮；三苗被流放到三危，他的后代发展成西戎；鲧被流放到羽山，他的后代被称为东夷。由此可见，古代的正统观念虽然歧视边疆民族，但却又认为少数民族与华夏同出一源。

按照《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为炎帝与黄帝。前面我们提到氏族公社时期分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后来随着氏族公社的不断扩大和合并，逐渐形成了部落，几个部落联合起来，成为部落联盟。黄帝就是我国古代黄河流域一个很有名的部落联盟领袖。

“黄帝”和“皇帝”不是一回事，“黄帝”是一个具体的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而“皇帝”则是秦始皇发明的称号，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各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才叫做皇帝。

传说黄帝的先祖是有熊氏。有熊氏的首领少典与一位叫附宝的姑娘结为夫妻，两人相亲相爱，朝夕相处。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附近一条叫姬水的地方玩，天渐渐黑了。他们刚想回去，天空中突然传来雷声，接着一道道弯弯曲曲的闪电掠过天空，回到家，附宝就怀孕了。消息传开，族里的人们纷纷议论说：“附宝是受了上天的灵感怀孕的，一定是有天神要问世了！”

后来，附宝生下了一个虎虎实实的男孩子。他刚生下来，双目炯炯有神，

很快就学会了说话；他非常聪明，稍长大些就能通百事、断是非。那时，人们认为帝是万物的主宰，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称作“五德”。有熊氏的人们崇尚土德，土是黄色的，而这个孩子又是天神转世，所以就给他起名叫黄帝。又因他长在姬水，居住在轩辕之丘，于是就以姬为姓，以轩辕为号，所以后世也常把黄帝称作轩辕氏。

黄帝长大以后，才智过人，再加上好多人都说他是天神下凡，所以就很自然地把他推举为有熊氏的首领了。他不负众望，不几年就使部落强盛起来了。又过了些年，人口越来越多，黄帝觉得姬水一带的土地比较贫瘠，生产的粮食不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便率领人们辗转来到了涿鹿（今河北省北部），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黄帝准备在这里长期居住下去。

涿鹿一带是一个叫炎帝的势力范围，结果双方为了争地盘在涿鹿附近的阪泉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没有办法，同意把两个部落合并，由黄帝担任炎黄部落的首领，自己担任副首领。这个炎黄部落就是中华民族的雏形。

炎黄两个部落合并以后，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正当炎黄部落联盟不断发展的时候，在它南边的九黎族打过来了。九黎族的首领叫蚩尤，十分凶悍，他率领的军队也个个作战勇敢。

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落入他人之手，黄帝决心率领部落人马奋起反击，把侵略者赶出去。于是，在涿鹿之南，两军相遇，一时间烟尘滚滚，打得地动山摇。

为了打败蚩尤，黄帝派人制做了一面巨大的战鼓，又让人训练了一批凶猛的野兽。在决战中，黄帝擂起战鼓，雷鸣般的鼓声，在战场上空轰鸣，黄帝的军队士气大振，士兵们赶着野兽，高声呐喊着冲向敌人。蚩尤的军队被这震耳的“雷声”和雄壮的队伍吓呆了，一下子乱了阵脚，四处奔逃。混乱中，蚩尤做了俘虏，后来被黄帝杀了。九黎部族也全都并入了炎黄部落。从此，黄帝的威望更高了，成为了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各部落共同拥护的首领。

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与融合，反映着黄河中下游大氏族部落集团间长期交往、互相影响，最终通过兼并与征服结成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

黄帝以后，以禅让方式推举、确立大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此后，随着夏启对禅让制的破坏，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融合，华夏族体的雏型已经形成。经过春秋战国，到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时，华夏民族共同体以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集团交融汇聚形成为核心，由四方各族分化出一部分在河、淮、江、汉地区融合而成的了。所以，华夏是由多源汇聚复合成的民族共同体，它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也就是说，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自秦汉以后长达 2000 年的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几次民族大融合，到元明清时，当代中国各民族均已形成。2000 多年来，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形成，首先得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

家族由若干具有亲近的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我国古代的家族是以父系的血缘联结的，而若干出自同一男性祖先的家族又组成宗族。《尔雅·释亲》即把由同一高祖父传下来的四代子孙称为宗族。宗族和家族密不可分。所以，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维系亲

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的绝对权威——支配家族成员，甚至是生杀予夺，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它主要实行于统治阶级内部，成为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维护贵族世袭统治、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

确定继承秩序和在宗族内部依血缘关系区分尊卑亲疏、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二者相辅相成，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正如《礼记·礼运》所说，“大人世及以为礼”（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夏朝王位世袭成为制度，而夏王以下，各级奴隶主贵族也都是“世及以为礼”。而夏王的宗族被封为诸侯，既分享部分统治权，又承担为夏王效力的义务。

与此相适应，为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祖先崇拜被推进到新的高度。从文字学上看，“宗”是个会意字。《说文·宀部》：“宗，祖庙也。”宗的本义就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就是祖庙、宗庙。宗庙祭祀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由宗族中地位最高的成员主持。同一宗族的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庙，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墓地，同受宗法制度的约束。

到了商代，有了嫡庶之制，也就是在多妻的情况下，区分作为法定配偶的正妻和众妾身份上的尊卑，并从而规定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是宗法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长子曰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由此可见，法定配偶与其他配偶之间有嫡庶之分，尊卑之别。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更是日趋完善，这一阶段的宗法制度最为典型、严密。这一时期宗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的前提下，在宗族内部区分大宗、小宗，无论大宗、小宗都以正嫡为宗子，宗子具有特殊的权力，宗族成员必须尊奉宗子。

《礼记·大传》中有一段话，说的是诸侯宗族旁系的情况：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所谓别子，是与嫡长子相对而言的。别子不能把诸侯当作祖先，只能分出去另立一系，其后世奉之为始祖。这个分出去的别子又会有嫡子、庶子，同样世代以嫡长子为继承人，形成直系大宗。别子的其余诸子，应尊奉继别者为宗，相对成为小宗。他们也是以嫡长子为嗣，这个嫡长子无权继别，但可继祢，称继祢小宗。祢，是已故父亲在宗庙中的神主。庶子除了宗奉直系大宗外，还得宗奉这个继祢小宗。以此类推，根据五世亲尽的原则：规定连同本身，只向上推到第五世高祖，也就是一个人只要宗奉继祢、继祖、继曾祖等小宗。即“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然而只讲五世而迁，一个宗族又会分裂为无数小的宗族或家族而漫无统系，因此又要强调“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也就是大宗要永远受到宗奉。

与宗法制度有关的还有丧服制度。丧服指居丧期间的衣服制度，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缟麻五等，称为五服。丧服不同，居丧期限也不同。丧服的等级是根据与死者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的，血缘越近，丧服越重，居丧时间越长，而且嫡庶有别，男女有别，这也是宗法思想的体现。

秦汉以后，宗族与各级政权逐渐分离，严整的宗法体系不复存在。因而后人说：“自世爵世禄之制废，而宗法始坏矣。”但是，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各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维护尊长特权，约束族人思想行为，以巩固统治秩序的规范和办法的宗法制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顽固地存在着，起着巨大作用。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一些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强大的宗族，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控制一方。到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了士族制度：高门望族成为族，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庶族”。士庶有严格的区分。官吏的选拔全看家世、出身。士族子弟，即便无才无德，也可官居高位，而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总是被列为下品，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宋明以来，家族制度以宗谱、宗祠、族田、族长、族规为表现特征。

家谱的普及达到“家之有庙，族之有谱”的地步。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社会，几乎没有无谱之族和不入谱之人。正如清代学者程瑶田所说：“族谱之作，与宗法相为表里者也。”修家谱是宗族中的一件大事，由族中头面人物主持，其目的是“敦孝弟、重人伦、睦宗族、厚风俗”。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祭祀时繁缛隆重的仪式充分体现了封建伦理，展示了礼教规范，是一种教化的手段。此外，宗祠也是处理宗族事务，执行族规家法，教育本族子弟的场所。

族田是全族公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土地、房屋等。由于族田可以缓解贫民的反抗斗争，有利于封建统治，所以封建朝廷把购置族田当作“义举”而大力提倡，对捐资较多的人予以旌表。族田的收入除祭祖、办学、办理一些公益事业外，主要用于赡族。族田的赡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宗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加强了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性，从而诱使他们依附于宗族中的权贵人物。

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一族最高首领，一般由年辈较高的人担任。但他们往往是族中最有财富和权势的，一般都是豪绅地主。族长的权力很大，主要有主持祭祀典礼之权、主管族产之权、对族人的教化和惩罚之权，以及处理族中各种纠纷、调停争端之权。

族长是根据族规行使权力的。族规是宗族的法律，起着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对族众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不同宗族的族规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却都以三纲五常为基础，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宋明理学的色彩这些共性。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尊崇君权，履行对封建国家的义务；规定祭祀祖先的礼仪，宗族首领的推举办法和享有的特权，宗祠、族产、宗学的管理制度以及族产收入的分配办法等；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规定不同宗族成员不同的等级名分和行为准则；宣扬同族一气，不论贫富应各守本分而又互助互爱，规定了敦本睦族的一些措施；规定对族人立身、持家等方面的要求和禁约；规定立后承继的原则和办法；规定对违反族规家训、败坏纲常名教、损害封建国家和宗族利益的族人的处罚办法。族规虽是民间规约，却具有合法地位，在封建国家的允许之下发挥效力，补充国家法律的不足，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度。人的社会地位与尊卑贵贱都有严

格地区别。但是在尊师问题上，这种无所不在的等级观念却被打破了。师的位置提到了与君并提的高度。《尚书》中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而在民间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也反映出君师并提，老师也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有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是父”之说。可见尊敬师长已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的道德风尚。

古人讲尊师，不仅要求态度恭敬，而且要诚心诚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师长绝不失礼。大家熟知的“张良桥头纳履拜师”的传说，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好品德。

“一日为师终身不忘”。古人对老师的教诲之恩总是深深感激，他们称自己的老师为“恩师”。正如荀子在《致仕》篇中所写：“水深而回，树落则本，弟子通利则思师”。反映的就是弟子对老师的那种流水对源、落叶对根的深情。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有尊师的美德。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古人竟能“不论贵贱贫富”来尊师。

商代时，统治阶级为了教育他们的子弟，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机关，由有德有位的“国老”和有德无位的“庶老”执教，均称之为师。甚至当时一些杰出的奴隶也被尊为师，如商汤时的伊尹，就是出身奴隶阶级的著名的老师。

春秋时代教育事业蓬勃兴起，各家学派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阐明思想。而当时的几个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出身都很微贱。如老子是周王朝管理图书的人员，孔子、孟子、庄子家境都很贫寒。孔子做过办丧事的吹鼓手、管理仓库、牧场的管理员等；孟子则依靠母亲织布维持生计；庄子则做过“漆园吏”；墨子出身低贱。聪明愚笨，贤与不肖，都应施以教学。史载孔子曾收 3000 名学生，分属各个阶层，孔子都同样认真教诲。

“有教无类”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世界性的先进意义。它打破了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对发展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思想、强化社会道德、提高民族素质，有很大进步意义。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推动之下，中国逐步形成官学、私学并举的教育模式，再加上有才有德的人均可为师，中国古代教育一直呈现出非常繁盛的局面。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达是华夏文化宝库中有着无数瑰丽珍宝的重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它的建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的彻底破坏，私有制正式确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世袭制在中国的确立，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首领“禅让”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奴隶社会的到来，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奴隶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这是历史的向前发展。

夏族，姓姒，是居住中原的古老部落，据说原来活动在陕晋一带，后来从西向东发展，逐渐迁徙定居到伊洛河汾地区。夏族最后定居在豫西、晋南一带，伊水、洛水之间是他们活动的中心。《逸周书·度邑解》认为夏族居住在颍川、南阳一带，汉代人则认为那是“夏人之居”，如《汉书·地理志》云：“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汉朝时颍川郡在今河南省境内，南阳郡的大部分也在今河南省境内）。周初分封唐叔去统辖晋南汾水流域一带，称那个地区为“夏墟”，可见那个地区也曾是夏人活动的中心。

夏族的世系，在禹以后比较清楚，在此之前，只能追溯到鲧，再往前的话，就比较困难了。虽有线索可寻，但均是神话中的人物，难以视为可信的史实。

如记载古代帝王世系的较为重要的书《世本》云：“颡项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就是说，颡项是鲧的父亲，鲧则是禹的父亲。而这个颡项，正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著名人物。他的神话故事很多，据说他是黄帝的孙子。在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尊奉的“三皇五帝”旧史系统中，他被列为“五帝”之一，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继位后确立了部落首领的权威，宣称首领的职责是代天行事，管理天下的民众；黎民百姓的职责是安分守己，听从号令。百姓随便议论首领，就是大逆不道；听信坏人的挑唆，反抗首领，更是天地不容。同时他还规定了男女之间的严格界限。他规定：正在走路的妇女见了男子，必须迅速躲避、让路。他说妇女身上有一种“晦气”，若不躲避，就把她拉到十字街口，由巫婆们肆意侮辱，以除掉“晦气”。妇女们不堪忍受，只好自认倒霉，见了男子就慌忙躲避。从此以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越来越厉害了。不过因为颡项毕竟神话成份居多，因此有关夏的确切世系，最早也就追溯到“鲧”，比较适宜。

鲧是禹的父亲，各书所记相同，无疑应是可信的。鲧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新的社会格局也开始出现了，人们一面遵循悠久的传统而贯彻原始民主、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受着财富、权势的诱惑和刺激而不再平和宁静。旧的传统虽然在实际上遭到践踏，但并没有被废止，被抛弃，而且至少在形式上它仍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依旧放射着神圣的光；新的人物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此刻的他手中的暴力之剑并不指向旧的传统，而是利用旧传统为自己权势的建立开道。鲧作为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便被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鲧是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然而他却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他曾接受尧的任命，负责治理洪水。他试图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但堤坝倒塌，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水患，治了9年也没有成绩。相传舜摄政以后曾视察治水情况，

发现鲧治水多年却毫无成绩，就下令把鲧在羽山杀了。尽管天下之人对舜杀鲧的做法没有异议，但对鲧还是深深怀念，表现在神话里，便是这样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地上发生了特大的洪水。洪水滔天，冲垮了房屋，淹没了田地，还淹死了许多人。鲧看到当时的惨况十分着急，他知道只有天帝的“息壤”才能平息水患，“息壤”相传是能够自己生长不止的神奇土壤。因为事情紧急，他来不及请示天帝就私自拿了天帝的“息壤”到人间治理洪水去了。天帝得知鲧私自拿走了“息壤”，勃然大怒，也没调查他为什么偷走“息壤”就下令让祝融在羽山郊外杀死了鲧。后来天帝知道了鲧偷走“息壤”的原因，很后悔杀了鲧。正好鲧的儿子禹出生了，天帝就让禹到人间去把洪水治服了。

鲧不待帝命而将“息壤”自天庭窃归人间，终至为治水而献出生命，其事迹颇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取火的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表达了鲧具有不惜生命，为当世除害的精神，塑造了一个正义、勇敢的英雄形象。

虽然鲧治水的事业，没有最后完成，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治水所以没有完成，其责任也不能完全归之于鲧。即使从流传下来的关于治水的整个传说故事来看，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分析：虽然鲧的治水失败了，禹的治水成功了，但禹的成功也离不开鲧。因为禹治水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鲧之业”，是“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因此，鲧和禹一样，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然而，鲧毕竟是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仅表现在他的治水上，更重要的是他政治上的被打倒。按古史上的一些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放逐而死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却在于鲧与舜争权夺位。如《韩非子·外储说右》载：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如《吕氏春秋·侍君览·行论》说：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以上这两段记载，生动表现出了鲧的权势欲及这种权势欲给他带来的后果。他在表面上是反对“尧以天下让舜”，实际上是自己要夺取权势，“欲得三公”。因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最后被殛死于羽山上。鲧在平时的威信并不高，反抗部落联盟的命令并且摧残好人；禀性固执直率，恣情自用，并且贪心不足。由此可见，鲧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死的。然而鲧毕竟是那一时代的英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儿子禹的身上继续延续并进一步发扬，终于使禹获得了成功。

禹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就是治水。在他的父亲鲧治水失败而被放逐羽山死后，作为惩罚，禹接替了他父亲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禹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共同向洪水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禹总结了鲧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放弃了筑堤堵水的办法，改用疏导的办法，终于制服了洪水。应该注意的是，禹治水成功和鲧治水的失败，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能的大小不同。这件事情表明，在鲧的时候，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不强，到了禹的时候，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

的水平，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也就加强了。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交换和发展，从而加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为向奴隶制度的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关于禹治水的情况，《墨子》中有记载：

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履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禹堵塞洪水，又开决江河使四方的夷族与九州之地都能相互交往，这以后，天下著名的河流就有三百，其支流多达三千，其他小河流无计其数。禹亲自拿着盛土的橐和挖土的耜参加劳动，使河流渠道纵横交错。禹东奔西走，水里来，泥里去，连腿上的汗毛都磨掉了，他栉风沐雨，操劳奔波，使万国都得以妥善安排。禹是一位大圣，竟为天下而如此劳苦。

从我们今天的历史主义观点看，禹作为跨越文明时代门槛的伟人，其卓越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他治水事业中的公而忘私、艰苦奋斗，而且表现在运用计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夏王朝奠定了基础。他的贪欲和权势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评价他的历史作用与用今天的伦理观点对其作为进行道德分析乃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

那么，离又是怎样一步步地表露他的诈谋并最终夺得了权势的呢？

他曾经对舜和皋陶说：当我娶涂山氏女儿的时候，辛日结婚，只在家里过了辛、壬、癸三天，到甲日就忙着去治水。后来生下了启，启在家里呱呱地啼哭，我都没有功夫去抚育他，我只想着治理水土的大事业。终于辅弼天子设立了五服制度，使管辖区域有了方圆 50 里之大，每州设立 12 个师，直到四海边缘，都普遍地设立了五长。禹治水的功劳当然不容否定，但他这样自我标榜，并将一切业绩归于自己，就不能认为是完全出于公心的了。禹到处做出一副积极进取，勤勉辛劳的姿态，实际上是力图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舜当时是部落联盟盟主。他与禹之间的关系便应当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了。在鲧被放逐诛杀之后，禹审时度势，用极大的毅力压抑了自己的不满与怨恨，反而更恭谨地侍奉舜，博得了舜的欢心，被任命为司空，担负主持治水的重要任务。

《吕氏春秋·行论》中说禹在舜的左右总是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出，以表示对舜恭敬。尽管禹未必如此奴颜婢膝，但他确实非厚实怯懦之辈，在影响和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禹便敢于与舜对抗。据《史记·夏本记》记载，禹曾用离别妻、子，外出治水，“以故能成水土功”的业绩自诩，并以此回绝舜对他漫游淫乐行为的批评。禹既要利用舜的威望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又要排斥异己，削弱舜的势力，从而达到取舜之权位而代之的目的。禹的诈谋应是卓有成效的。皋陶是舜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虽然驳斥过禹的言论，但终究还是被禹拉拢利用，作为主持刑罚的“士”，他曾“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就是命令民众都必须以禹为榜样，假若不按照这个命令去做，那么就要用刑罚制裁。在舜的后期，禹的地位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禹在行动中已一步步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势力，因而“禹逼舜”的悲剧的发生也就成了社会发展中必然的事情了。然而，当时传统的民主推举部落首领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因而禹接替舜的位置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进行

了“禅让”。禹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博得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终于较顺利地取得了最高统治者地位，被拥戴为“夏后氏”，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确立了王权。

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又继续征伐三苗，他出征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誓师词说：“不是那种无礼小子，谁敢横行称乱，野蛮愚蠢的三苗胆敢作乱，我要代表上天惩罚他们。因此我今天率领你们‘群封诸君’去讨伐三苗！”参加这次战争的有众多氏族部落，声势非常浩大。经过激烈的战斗，“三苗”大败，向南逃往丹水、汉水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去了。战争中掠夺到很多战俘，他们都成了军事首领的奴隶。这种掠夺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禹的地位，并促进了奴隶制度的产生。

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禹又沿颖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邀请夏夷诸部众多邦国或部落的首领召开大会，这就是“涂山之会”。在这次大会中，有一个叫防风氏的部落对禹的权力不以为然，因此在开会时有意迟到。禹见此情况大怒，下令将防风氏处死。各部落的首领见禹如此厉害，一个个胆战心惊，从此唯命是从。古史中所载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的就是这件事。此时，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了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主，他们前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这次大会，乃是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步骤。

按照传统的“禅让”制，禹退位后接替其位置的人也要由部落民主推选出来。然而，社会在向前发展，此时的社会结构已较尧舜时期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于是禅让制也呈现出微妙状态。禹在位之时，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此举反映了禹的智谋和狡黠。皋陶是偃姓部落首领，早在舜的时期就有很高威望，他曾在舜和许多部落联盟首领面前高谈阔论，阐述选拔人才、治理天下、敬业安民的道理，并且他还是一位治理狱讼而著称的人物。禹选择皋陶为其继承人，便能够以此向天下表明自己是重视和真心荐举贤才的。皋陶虽然曾当众诘难过禹，使禹差点下不了台，但后为禹的手段所笼络，曾经“令民皆则禹”，因此，荐举皋陶，实际上是加强了禹自己的权力，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皋陶和禹年龄相仿。据古书记载，皋陶和禹同在舜帝手下任职，从言论和行为看，皋陶甚至是年长于禹。相传禹治水 13 年，舜荐禹之后过 17 年去世，所以禹继位时最少也有 50 多岁，而禹举皋陶之后 10 年于会稽死去，据说这时禹已经是百岁之龄了。由此看来，禹选定皋陶为继承人时，他和皋陶均已至耄耋之年了。选择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或稍长的老者为继承人，这正是禹工于心计的表现。因为这样的继承人是不会对禹及其儿子——启构成多大威胁的。

果然，皋陶被荐举之后不久即死去，禹又举荐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虽然伯益是法定继承人，但多数部落首领都向启表示效忠。他们说：“我们忠于启，因为他是禹王的儿子。”

为什么人们拥戴启而不信服伯益呢？这应当归功于禹的精心安排。原来随着禹王王位的巩固，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不应该落入他人之手，而应由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大家又一致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为此事，禹好多天都没有睡好觉。后来他想到，自己所以能顺利继承舜的权力，一是当年治水有功，二是舜选定自己继位之后，就把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都交给了我。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将来的大权肯定会落

入伯益手中。我为何不把治理国家的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空名呢？于是，禹就这样做了。果然，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高了起来。而伯益虽然是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就连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忘了。这样，禹一方面树立自己和族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举荐耄耋之年的皋陶，故意延宕其后继者伯益开始佐政的时间，造成伯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的事实。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即为启的继承权位铺平了道路。所以战国时有人便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禅让制度是上古时代权力结构演变的过渡形态。开始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他们受到广泛的尊敬、信赖。当时许多重大事情都必须由议事会与民众大会集体讨论决定。后来，各级首领的权力日益增长，他们在传递权力的时候不再满足于民主的、集体的决定，而是竭力寻找一种形式，既能有民主色彩，又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形式终于在尧时期被发明出来。那就是“禅让”。在禅让制度下，旧的民主传统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尧舜之际禅让过程中，“四岳”的意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然而，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意志毕竟在禅让制度中占了主导地位。如果说尧、舜时个人意志在禅让中尚未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到了禹的时期，情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禹先荐举皋陶，后举伯益，都是由他自己所决定的，尚未见到史料可以说明这些是由部落联盟其它首领讨论提名的结果。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强化，和这种趋势相适应，世袭制的出现是有着必然性质。禅让制就是世袭制的准备阶段，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说它是连接原始社会民主制与世袭制的枢纽。

禹运用自己的手腕与权力，为自己的儿子启铺平了一条通向王权的道路。使启能较顺利地接替了禹部落联盟盟主的位置，随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启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

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过程，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因为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是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遭到传统的旧势力的反对。

东方偃姓部落的伯益首先起来反对夏启。伯益原本是禹的法定继承人，在夏启继位后，他立即撕下了谦让的面纱，率领着强悍的东夷军队，来势汹汹地向启发动进攻。启虽有防备，但启的军队还是被伯益打败了，启也被俘获，囚禁起来。不久启又逃出，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最后一次交战时，伯益的部下纷纷向启缴械投降，启终于把伯益抓来杀掉。

反抗的势力不仅来自外部的东夷，也来自夏部落内部。夏族在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也起兵反对启，要求他把王位还给伯益。有扈氏在今陕西中部、东部一带，是仅次于夏后氏的一个强大的氏。早在禹的时候，就曾与有扈氏发生过战争。启亲自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泽。启在前线发布了誓师词——《甘誓》。他指责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上则轻蔑“五行”的天道，下则怠慢“三正”的人事。上天因此要灭绝他们，他要奉行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启命令部下听从指挥，奋勇杀敌，警告不听命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有扈氏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启开始并没有把有扈氏打败，大约经过一年的较量才征服了有扈氏。《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之，知义而不知宜也。”其实，他是死抱住氏族社会的旧“义”，不能跟着时代发展之“宜”前进，自然要遭到失败。

对有扈氏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夏王朝政权的初步稳定和世袭制的初步确立。为了庆贺夏王朝的建立，夏启在钧台大会诸侯，举行宴会，诸侯纷纷前来朝贺。夏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诸侯的正式承认。

然而，新与旧的斗争在新事物刚刚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还不会马上消失，旧事物总是不愿一次性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总要经过一番反复。这种斗争，在夏王朝的建立过程中集中表现为王位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之间的斗争。启传子太康后，太康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极大怨愤。东夷有穷民的首领后羿，把太康赶下了台。后羿是勇于向自然作斗争的英雄，传说曾在尧时射掉天上十个太阳中的九个而立了功。他做了正式国王后不久，又被他的亲信寒浞杀掉，寒浞取得王位。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仲康一直谋求复国，但由于连年流亡在外，身患重病，加上心情不愉快，很快就死了。他的儿子后相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被寒浞所攻杀，后相的妻子正在怀孕，躲开了搜捕，逃回了娘家有仍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少康。少康长大后开始为复兴夏朝做准备。后来寒浞得知少康是后相夫人的遗腹子，立即派出一班人马，去捕杀少康。少康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逃到舜的后代有虞氏那里。在那里他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寒浞因频繁用兵，招致民众反对，内部矛盾增长。人们听说少康是夏后氏的后代，于是纷纷前来投奔，少康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一切都准备好了，少康便起兵讨伐寒浞。寒浞多年来只顾享乐不理政事，大失民心，就是他手下的心腹将士们也早与他离心离德。于是被少康打得一败涂地。寒浞也在乱战中被杀死。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少康回到了夏故都。他祭奠先祖，安抚百姓，设置百官，重整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少康中兴”。从此，夏朝奴隶制的政权，才逐渐巩固起来。

夏王朝是从原始公社的军事民主制度中脱胎而出的奴隶主政权，它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与旧的传统的氏族制度和习惯势力发生矛盾。旧氏族贵族利用传统的“禅让制”，以反对夏王朝的王位世袭制；而代表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夏王朝，则要求确立王位世袭制，以巩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禹传子后，夏王朝经过启与伯益、有扈氏的斗争，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等事件，终于使王位世袭制战胜了禅让制。这一胜利，意味着奴隶制战胜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国家取代了部落联盟机关。

夏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并使世袭制在中国最终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世袭制代替了原始民主制和禅让制，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

大禹——一个站在阶级社会门槛上的伟人，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从此以后，“普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滨共王臣”，被儒家学派涂上了一层深厚粉饰，世袭制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日趋完善，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扎根几千年而不衰。

商的建立

夏朝由启建立，中间经过太康失国，少康复国，到少康的儿子杼继位为王时，夏朝的强盛达到了顶峰，以后的王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传到了禹的第十四代孙子夏桀的手里。

夏桀生得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力气大得能把鹿角折断，能把铁钩扳直，能把高墙推倒，能赤手与虎豹搏斗。他不仅力气极大，而且才智不凡，聪明过人。只可惜他的力气和才智没有用到兴邦治国上，而是全都用到了吃喝玩乐上。

夏桀即位后，觉得打仗是个挺好玩的事，既可开拓疆土，扬名天下，又能抢掠财物，以供享乐。于是四处征战。东夷诸国招架不住，只好臣服于夏王朝，有些小国听说夏王桀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就送来金银财宝和美女，以保全国土不被侵吞。桀得到了这些奇珍异宝和花容月貌的美女，果然不再征战，回到都城恣意享乐。为了讨得这些美女的欢心，夏桀大兴土木，下令在洛阳建造一座倾宫。倾宫占地方圆 10 里，高 10 丈。宫室中心修一座瑶台，用洁白的玉石砌成。这座倾宫花了 7 年才完工，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费了大量的财物，害苦了老百姓。

当时有个大臣，名叫关龙逢，看到桀这样腐败荒淫，终日不理朝政，夏朝在一天天没落，于是就劝他以国事为重，悔过自新。夏桀不但不听，而且还把关龙逢给杀了。从此，好人都不敢再亲近夏桀，而坏人则成天阿谀奉承围着他转。夏朝越来越腐败了。

正当夏朝势力日渐衰落的时候，黄河下游有个国家——商国逐渐强大起来。商国是夏朝的属国，当时的国王叫汤。商汤看到夏桀荒淫无度，凶狠残暴，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暗暗下定决心要推翻这个腐败的夏朝。商汤决定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把众诸侯国争取过来，然后进军夏国。为了将来进军方便，他还将都城迁到了亳（在今河南郑州附近）。当时商国不仅畜牧业发达，农业也发展起来了，国库中经常储藏不少粮食。碰到哪个邻国有天灾，商汤总是主动救济，因此，商国和各友邻国家关系都很好。

汤在商国笼络百姓，贤明治，邦交邻国，准备进攻夏国。但此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夏桀的耳朵里，于是夏桀就设计把汤骗到了夏国，软禁在夏台（又称钧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见此情况，就派人给夏桀送去了很多珍宝及 10 名美女，夏桀见了这些礼物，原先的怒气早消了大半，不久，就把商汤放回来了。

商汤死里逃生，对夏桀更加憎恨了。另外，他在夏国被囚禁了一个时期，对夏王朝的腐败看得更透了。这样，他不仅更坚定了推翻夏桀、取而代之的信心，而且加快了灭夏的步伐。

商汤回到商国，一方面劝说那些受夏朝控制的小国反叛夏朝，归顺商国，又消灭了那些死心蹋地跟随夏朝的小国；另一方面，在国内积极备战，加紧笼络老百姓，表明自己是个贤明的国君，好让老百姓听从他的指挥。

不久商汤做好了准备工作，成立了讨伐夏国的联军，由他亲自率领浩浩荡荡地向夏国进军了。夏桀听说后，顾不得饮酒作乐了，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保卫都城。但商军兵强马壮，有备而来，士气旺盛，而夏国的军队久不征战，平时又不进行严格的训练，军纪又很涣散，战斗力很差。所以，两军刚一相遇，夏军的防线就崩溃了。夏桀看到大势已去，便带着几个

护卫，仓惶逃窜。商汤带领部队紧追不舍，终于在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将这个暴君俘获。商汤本想杀死夏桀，以平民愤。但转念一想，自己一向以宽厚仁慈著称，今天这样做，恐怕民众会对他有别的看法。何况大局已定，于是，他把夏桀囚禁在南巢，自己率领部队回亳城了。被软禁在南巢的夏桀不久就郁郁而死，延续了 400 多年的夏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即距今 3700 多年以前，商汤正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汤建立了商朝以后，商人开始由氏族部落向奴隶制国家转化，并渐渐强大起来，初步建立了专制王权。但由于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作为文明时代的王位继承制未固定下来，因而商出现了王位纷争的“九世之乱”，商朝国势几度衰退，政治力量削弱，臣服的万国也纷纷摆脱其控制，商与原敌对万国之间战争不断。到汤的九世孙盘庚继位后，为振兴商朝，断然迁都于殷，在此过程中，专制王权得以加强，旧部落贵族的力量被打击削弱。盘庚迁都是商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它平息了商王朝历时几代的政治动乱，王位继承制得以解决，并建立了稳定的奴隶秩序。从此商人结束了流徙不定的生活，并创造了繁荣的青铜文化，发展丰富了华夏文化。盘庚迁殷，使商王朝很快越过了衰微动荡阶段，逐步进入了鼎盛时期。

盘庚是商朝的建立人汤的九世孙，从他哥哥阳甲那里继承了王位。他即位的时候，商王朝正面临着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动乱的根源集中地表现于对于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上，这需要向前追溯到商的建立初期。

商人原来是居住于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后来渐渐发展壮大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到了汤继位的时候，进入了文明时代。

公元前 16 世纪，汤兴兵灭了残暴的夏，建立了商朝，商人渐渐完成了由部落形态向国家转化的过程。最初氏族的各级家长，就演变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各环节。但是做为一个初期的奴隶制国家，奴隶体制尚未完善，商王朝在许多地方还遗留有氏族公社的痕迹，特别是做为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王位继承制——还没有被固定下来。在盘庚之前的八世商王，王位继承始终是兄终弟及的，直至幼弟死后，才可由下代人继承。这是商建朝初期，伊尹所形成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临时采取的办法，尽管嫡长相传从夏以来已经确定下来，而且商族人在商汤以前也是嫡长相传。商汤灭夏 13 年后死去，倘若按旧习规，应传位于长子太丁，但太丁已早死，于是便应再传位于太丁之子，但其子太小，不能管理国家大事，倘若勉强把王位传给他，必定会不利于新王朝的巩固。因而，伊尹破除旧制，采用兄终弟及再还位于长兄之子的办法，这于统治阶层有利，也无悖于嫡长相传的原则。如：商汤死后，伊尹就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 2 年后死去，又立其弟仲壬为王。仲壬即位 4 年后就死去了，于是伊尹再立太丁的儿子太甲，（可能是经过这么 6 年，太甲已成人，而具备了继位为王治国的条件）。但后来也会出现不愿还位于长兄之子的现象，因而在两代人之间的王位传递中留下了争端，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王位争夺。

从历史资料来看，在从仲丁到阳甲九个国王之间，商王朝基本上处于激烈的王位争夺而造成的动荡状况中，史称“九世之乱”。盘庚曾祖父祖乙死去后，王位传于长子祖辛，祖辛死后，又传位于其弟沃甲。沃甲死后，按上两代之例，应传位于其子南庚，可是不知为何原因，祖辛之子祖丁继承了王位。但南庚并未死心。当祖丁死后，照例当由祖丁的亲兄弟即位，如无亲兄

弟，则当由其子直接继位，然而结果却被南庚继承了王位，这是商代王位继承中独一无二的特例，即堂兄弟继位。这期间诸王在位时间都不长，到阳甲传王位于其弟盘庚时，两家支中均衡力量被打破了，此时，矛盾在激化，动乱也在酝酿之中。

王位纷争，极大地影响了商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在这期间商王朝曾四度迁都；仲丁时候，由西亳（今河南偃师）迁到敖（今河南荥阳东北）；河檀甲即位后，又迁都到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时迁到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在位时又迁到奄（今山东曲阜）。在这短短的 180 余年里，四度迁都，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破坏，也使广大社会下层平民深受其害，因为每次迁都，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都会受到一次破坏。由于这多次迁都后，到盘庚即位时，商人已远离其祖先居住的河洛平原，从华夏的中心地区迁到了偏远的东方。

当时社会很不稳定，商王朝的政权力量也逐渐衰弱下去，原来与商朝敌对的偏远小国，也可谓乘人之危了，不断向商朝及其属国进攻，商王朝陷入了长期战乱之中。加以仲丁时期起商人就与东方夷人之一支——兰夷发生了战争（当初仲丁迁都便是为了征伐东方的兰夷，但到河檀甲为王时，由于殷朝又衰弱下去，加以东方夷人此时又强大起来，威胁了敖都之安全，又造成了河檀甲迁都到相，即今河南内黄之地，用以避战，此后二者冲突时有发生）。人民也陷于痛苦之中了。而且原先臣服于它的众属国也纷纷摆脱其控制而且停止向商纳贡。

盘庚便是在此种局势下，继承了商王位，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希望振兴祖先的事业，但如何结束这长期纷杂的王位之争，如何稳定商王朝目前的政局，并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的统治呢？盘庚面临着众多的棘手的问题。

盘庚再三考虑，认为要解决这诸多问题，关键在于迁都，重返商人以前居住的河洛平原，选址于殷。他为何偏偏选中殷呢？对于贵族阶层来说，他们的家产将在迁都过程中蒙受损失，因而他们不会同意。广大平民经过四次迁都，都已厌烦了，他们渴望着一种安定的生活。但是迁都于殷也有不少有利因素：

从国都新址殷来看，它有着优厚的地理条件：临近于洹河，有充足的水利资源可以利用，而且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对于当初社会形态来看是有利的——便于发展定居农业。

而且河南黄河沿岸，自早便是华夏民族和文化发源地，是华夏之中心。商人先辈便在此居住过，对这里的气候、地理条件已适应，而且成汤建商时便定都于此；在此等条件下，盘庚若迁都于此，以恢复“商汤之政”为号召，是既得地利又得人和的，可树立自己的威望，提高自己在平民心中的地位。

而且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刚即位的盘庚来说，最重要的是——迁都对于商王朝混乱的政治局面是一个重大转机，有利于他巩固自己的政权。“九世之乱”时王位纷争，得王位者为摆脱失王位者及其家族同党的反对甚至于夺权，便时常采取迁都的手段，用以削弱敌对方的力量。祖乙夺位后，迁都到耿；南庚夺位之后，又迁到了奄，这都是他们即位以前的封邑或是同党势力的聚居地。到后来祖丁之子阳甲夺回了王位，但经过这番争斗，自然大大地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力量，所以《史记·殷本纪》里说“帝阳甲之时，殷衰”。而自从南庚迁都于奄之后，在位 25 年，因而在奄地南庚家族盘根错节，形成

了一股牢固的势力，而阳甲在位仅7年，加上当时国力衰微，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对于盘庚而言，若不迁都，离开奄，无疑于置身于虎穴，随时都有可能被南庚家系给夺了权去，占了王位。为了摆脱原南庚势力的影响，及阳甲之世的衰象，迁都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一可稍避其锋芒，远离其势力老穴，使南庚家系失去与商王争夺王位的基础，二来对于其它的势力较弱的贵族也是一种威慑，使之易于摆布。

盘庚再三权衡，断然决定迁都。他将迁都一事公诸于众，便引起了众多臣民之不满，顿时怨言四起；迁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但是盘庚下定决心，在专制王权的作用下，推行了自己的措施。

他召集全体臣民，向他们训话，解释了迁都的诸种理由。并抓住广大平民的心理，向他们许诺，建设新都后，恢复实施“商汤之政”让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

经过几番试探后，盘庚认识到迁都的真正阻力，也是最大阻力，来自于上层贵族集团。自仲丁以来的贵族们日益腐化，盘剥人民，与广大下层平民也存在着矛盾。盘庚抓住这一点，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不惜与贵族集团决裂，他斥责那些乱政的大臣只知道聚财敛宝，而不能体恤平民。并指出，反对迁都者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人，他们这样做是有其私利的，他劝诫大家不要为其谣言所惑，而被利用，徒损自己的利益。这样盘庚获得了广大平民的支持，这是迁都如何面临着顽固贵族的抗议而成功的重要原因。

经过与守旧势力的坚决斗争，盘庚的愿望得以实现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他率领全体商人渡过黄河，迁到了殷地，回到了商人祖先曾居住过的河洛平原。在那里，商人怀着喜悦的心情，齐心协力修筑了城墙，修建了宫殿和宗庙，修建了自己的家园，在殷安顿了自己的住处。

经过迁都这事，盘庚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胜了第一回合，排除了内患，巩固了自己的政权，确立了自己的威望。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他趁热打铁，继续扩大迁都的影响。

为实现以前对广大平民的许诺，并稳定才迁都之后的人心，他开始积极地推行恢复“商汤之政”。

盘庚对商王朝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观察分析，发现给人民造成极大危害的是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而人民对于贵族的贪暴奢侈也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阶级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针对这一要害，盘庚制订了一个实行施政的方针，以选贤任能、惩恶扬善，论功行赏为核心，他说：“我不任用那些贪财聚货的人，而要倚重那些为臣民着重策想，能体恤人民，使人民能够生财致富，安居乐业的人，并要以此来考察他们的政绩。”一方面，他彻底打消了人民的疑虑，取得了广大平民的支持，缓和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打击了不法贵族的势力，加强巩固了专制王权。

由于盘庚的施政方针切中时弊，所以深得广大下层平民支持，在人们的积极热情的工作下，新都的生活开始走上了正轨。但是那些在迁都过程中已遭受了沉重打击的贵族集团，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利用商人尚未完全适应在殷地生活的时机，在暗地里大肆散布流言，在平民中煽动不满情绪。贵族集团的不合作，使盘庚进一步认识到——遏止贵族势力的膨胀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召集了文武百官，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从前我先王任用旧臣管理政事，政令合乎情理，大臣们没有不遵守履行的，也不敢说什么越轨的话。现在你们却编出一些邪恶的话来蛊惑人心，

我真不明白你们用心何在！现在我也是根据先主的法度办事，也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而你们却对下隐瞒我的政令，与我暗地里作对。如今你们所做的坏事都已败露，这正是害了你们自己！有什么意见你们不能直接向我说，却要背地里搞那一套呢？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从今以后，你们要努力做好本职以内的事，不许再散布任何谣言，否则将受到惩罚，到那时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对于众臣，是不分远近的，都一样看待——用刑罚来惩治恶行，用爵禄来表彰良好的品行。”

他的训话在贵族中引起极大震动，加以他严厉地一丝不苟地实行，慑于专制王权的威严，贵族集团再也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了。

从此商人结束了长期流徙不定的生活，在殷安定下来，从盘庚之后一直到商灭亡的 273 年间再也没有迁过都城。

盘庚迁殷，使商王朝政治局面迅速安定下来，国力得以恢复并渐渐强盛起来，与商王朝相邻的小国又纷纷向商称臣、朝贡。商国还数次兴兵攻打居住于西方和北方的舌方、土方、鬼刚等国，它们都是与商或其属国相邻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曾多次侵扰商及其属国和边境地区，对商王朝的统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威胁，经过几次战争，商王朝制服了这些小国，解决了这些威胁。因此可谓，盘庚迁都为日后武丁时商王朝的全盛时期提供了先决条件。

迁都之后，商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从盘庚到商末几代人间，劳动人民创造了比其前期更为繁荣的青铜文化。在迁殷后，青铜手工业已达到鼎盛时期，不仅王都及其中心地域，即使在边远地区也可铸造出工艺高超，造型优美，纹饰繁复而精致的青铜器，如山东益都出土的亚西鬼方彝，湖南宁乡所出之四羊方尊、戈卣等，堪称精品。

事实证明盘庚迁殷的这一决策是很正确的，它结束了商王朝长期动乱的政治局势，巩固和发展了商王朝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使商王朝动荡不安的隐患得以解决——王位继承制固定了下来，盘庚以后的王位继承又有更细的规定——同一代诸兄弟间，是兄终弟及，而下一代人之中，则由幼弟之子继承王位；而到了武乙文丁后，又进一步完善了王位继承制——取消了兄终弟及之制，即完全施行嫡长相传之制。而这一变化，又是与盘庚迁殷有紧密联系的。盘庚为商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盘庚迁殷对于加强发展专制王权，完善国家机器也起了重大作用。

在商朝前期，商汤之时，便以夏朝奴隶制国家为蓝本，改造了商人的军事民主制机关后，完成了向阶级国家的过渡并建立了商人奴隶主统治的国家。但这个国家机器直到盘庚迁殷以前还是幼弱的。如盘庚以前的王位纷争、多次迁都便是这种弱点的表现。而且由于尚处于形成阶段，因而与旧有氏族公社还存有关联，王朝中的文武百官大多是有以前的部落贵族特性的。从商王朝建立开始，他们就与新生的专制王权存在着尖锐矛盾。贵族集团往往利用氏族公社中遗留下来的某些特权，干预国家事务。这对于奴隶制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严重障碍（这种障碍在盘庚迁殷过程中也自然地表现出来了），而盘庚的迁殷之成功，在客观上打击了保守的贵族势力，消减了这种障碍作用，推动了奴隶制国家的发展。

盘庚迁殷以后，便开始致力于建立稳定的奴隶制度秩序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经过 60 到 70 年的稳定发展，到了武丁朝时代就逐渐强化了，下面分

别从军队、官吏、刑法来看看。

军队 军队是统治阶级的国家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商人从商汤时起就有这样一支军队，所以才能灭夏，但其组织很不完备。盘庚迁殷后，尤其是武丁时代，由于战争等原因，促进了军队迅速壮大。而且兵种也健全了，不仅仅有步卒，而且有了战车和骑马击敌的马师和手持弓箭的射手。

官吏 商代的官僚队伍非常庞大而复杂。从盘庚迁殷后到武丁时期，官僚体制已初步具备了后来所有的专制王朝通行的中央与地方官之分；中央又分为助王处理国事和为王室宫廷服务的事务官，即所谓外朝与内廷的官僚体制。这也是奴隶制国家机器完善和强化的又一重要表现。

刑法 盘庚迁都以后的商代统治者加强了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手段。盘庚迁都于殷之后，便立刻加强法制，他决定用旧有典制去整顿当时的法纪（这旧有典制可能就是商汤之世时的《汤刑》）。而随着盘庚迁都后法制的加强，作为贯彻法制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监狱、酷刑也就跟着扩大了。

专制王权本身是残酷的，但对当时发展的商王朝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加强奴隶制国家机器，这也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

盘庚迁都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对商后期历史起着重大影响。

西周王期的兴衰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之后的第三个王朝。孔子曾经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充满向往和憧憬之情。周礼中所提倡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朝廷有位”、“男女有别”和“贫富轻重皆有称”等都是儒家所称颂的。后来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封建社会 2000 年来统治人民的绳索，可见西周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商邦是个大邦，周邦是个小邦，周邦能推翻商朝，其中历经文王、武王、周公的治国与征战。周朝建立后经 34 朝统治了 800 余年，其典章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向来被称为周统治的两大柱石，后世王朝的建立或多或少地都借鉴于此。

周族是祖国大地上与夏、商同样古老的部落，其先祖后稷曾任尧的农官，协助大禹治水，周的明确世系就从这里开始。后稷原名弃，这个奇怪的名字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弃的母亲叫姜嫄，是羌族的女子。有一天，姜嫄和伙伴们去野外游玩，在路上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好奇的姜嫄想和巨人比比脚，把脚放进脚印中。奇怪的事发生了，肚子格登一动，姜怀孕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出生了，可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会带来灾祸的。姜嫄把小孩丢进成群牛马经过的隘道中，想让牛马把他踩死，可没有一头牲畜踏他一脚，姜嫄一看急了，又把他丢入深山密林，通常没有人迹的山林中却出现了许多人。姜嫄又把他丢入结冻的河里，想把他冻死，却飞来许多小鸟，用暖和的翅膀遮住他为他御寒。姜嫄实在没有办法，干脆把他抱回来，想把他抚养成人，看看他到底有何神异。这就是“弃”名的由来。

弃在小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当别的小孩追逐嬉闹的时候，他却挖地，松土，在地里种上麻、豆之类的。养成了种植庄稼的习惯而且喜欢钻研，有了很深的学问。好才的尧任命他为农官，使全国都有了很好的收成。在舜时被封为有邰氏，封地在姬水附近，所以又叫姬氏。古时主要作物为黍、稷，故被尊为“后稷”。

后稷死后，儿子“不空”继承父亲的衣钵。古字“不”为“丕”即大的意思，空为“窟”的古字。看来“不空”时候，姬氏是住在深挖的土洞中，这时正值夏太康统治时期。姬氏因“后稷”也为农官。但不知什么原因，世代以种植业为主的姬部落却转为放牧部落，这种农业状况一直延续到不空的孙子公刘的时候。

姬部落游牧到戎狄地区，公刘身处戎狄地区却不对畜牧感兴趣，一心想着先祖后稷的传统，公刘在农业方面确有天赋，带领部民逐渐改种庄稼，并且有了很好的收成，使姬氏部落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豳地是一个十分有利于种植庄稼的地方，公刘因而率领本部人民征服豳地定居下来，开始艰苦的创业过程。豳地得到开辟，姬部落逐渐繁荣起来了，而且吸引了不少外族部落，姬部落得到充实。在《诗经·大雅》中有很多关于公刘的颂歌。

公刘的第十世传人古公檀父在姬氏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他更加重视发展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在部落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邻近地区的戎狄部落比姬氏部落落后，处于游牧状态，富庶的姬氏部落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戎狄崇尚掠夺，经常掠夺姬氏部落的牲畜和人口。戎狄中的薰育部落还发动了对豳的大规模进攻，想把姬氏部落变为他们的牧奴。心地善良的

古公恐怕战争的损害要比避开逃离要大，带领一部分部民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陕西境内），到达岐山定居下来。

岐山南面的周原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姬氏部落在此又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因而被称为“周人”——定居在周原上的人们。

古公还是一个处理政事的能手，周人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城池和宗庙，设置了司徒、司空、司马、司寇等官吏，建立了国家，开始了周王朝的建设。因此，后世的周武王称古公檀父为太王。

古公的和善教育了儿子方伯、虞仲和季历，兄弟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但缺少治理国家的雄才伟略。檀父只有把希望放在孙子辈上了。季历的妻子非常贤惠，又是周人的同盟姜姓部落的女子，很得古公的喜爱。姜氏在生孩子的时候，恰好飞来一只红羽毛的鸟，嘴里叨着一块写满红字的绢帛停留在产妇的房屋上。字的大意是：“只有小心谨慎，才能保证事业成功。只有自强不息，才能千秋万代昌盛。”古公檀父看到这一切，心里十分高兴，认为使周族昌盛的人终于出现了，因而给小孩取名“昌”。古公檀父想把王位传给姬昌，可这与惯例不合。按惯例王位应当在太伯系里传递，或由太伯、虞仲、季历三兄弟相传再传位给姬昌，这就得延误周族的昌盛。太伯、虞仲十分乖觉，看到父亲十分为难，于是两兄弟假为古公采药的名义逃到荆蛮地区。

古公死后，传位给季历。季历逐渐和商结好，还亲自到朝歌去觐见武乙，得到武乙的赏赐。季历在军事方面很有才能，在商朝的支持下反击戎狄，洗雪长期的凌辱。武乙35年，征伐鬼方；一举击破12个部落，获得大片土地和大量奴隶，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文丁4年攻伐余无之戎，又大获全胜，被文丁封为牧师，管理商朝的畜牧业。文丁7年，攻伐豳徒之戎，杀其三大臣。通过一系列战争，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保证了周王国边境的安全，疆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随着一系列的胜利，引起文丁的猜忌，找借口把季历杀死。这样就埋下了商周仇恨的种子。季历死后，传位给姬昌，即周文王。文王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发动了对商的讨伐，结果被打得大败。这一仗把他打得清醒了，他认识到周邦的力量与商邦的力量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只有大力发展国力，等待时机才能报得了杀父之仇。文王表面上作出绝对服从商统治的姿态，暗地里却寻找贤士，发展国力，发誓要灭商为父报仇。

周人的首领从来就有招纳贤才的传统。古公檀曾经说过：“只有把才能出众的人请到周国来，我们才能变得强盛。”古公死后，周逐渐形成了“委人以贤不以亲”的传统。

文王表面上臣服商王，暗地里却无时不在作准备。遵循后稷遗训，大力发展农业，努力增殖人口，多方拉拢诸侯，以古公为榜样广求天下贤才。文王思贤如渴，很受当时名士的爱戴，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都投奔文王，千里之外的狐竹国的伯夷、叔齐也投奔文王。

文王励精图治，国力逐渐强盛，在西方诸侯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很多争讼不去找商王而来告文王。如虞芮之讼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当时的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和芮国（今山西芮城境内）为了争夺边界上的土地，经常兵戎相见，后慕名向文王求助。当两国国君到达周境去见文王的时候，见周国内耕田的互让田界，行走的作揖相让，官吏团结而不互相拆台，十分羞愧，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兵戎相见的事，都在自己国境内划出土地作为边界，《诗经·绵》中的“虞芮质蹶成，文王蹶蹶生”说得就是这件事。

文王受鄂侯事牵连被关在羑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消除商王的猜忌，

当纣王派人送去用文王大儿子伯考做成的肉汤时，文王装做不知道，若无其事地喝着肉汤。纣王听到回报后说：“人人都说西伯侯仁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他喝着自己儿子做成的肉汤却不知道。”文王还命令国内的人向纣王送去宝石和美女，终于使纣王认为其平庸无雄才大略而被释放。

被释后的文王一举一动都不敢有丝毫疏忽，更加恭谨，暗地却加紧准备。他觉得自己身边虽然有不少文臣武将，但还缺少一个能指挥全局的人帮助自己管理国家灭商兴周。因此，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

有一次，文王出猎，在出猎前进行占卜，卜辞中说他此次出猎不能获得什么珍禽异兽，却能获得一位异人。文王看后十分高兴，命令出猎，在渭水河边果然遇到一位老人在钓鱼，老人的胡须、头发都白了，坐在岸边自言自语地唠叨：

“鱼儿，鱼儿，愿意上钩的快快上钩来呀！”

周文王很纳闷：哪有愿意上钩的鱼呢？况且鱼怎能听懂人的话呢？再仔细一看，那鱼钩上竟没有鱼饵。他感到很奇怪，就走上前去和老人聊了起来。

原来这老人姓姜名尚，是个学问渊博、胸怀大志的人。他们越谈越投机，老人给他分析了天下形势，他说：灭商必须从长计议，今商气数未尽，必须等待时机。一切只有在暗中进行，免得惊动纣王，而遭到讨伐。姜尚的话句句打动文王的心，文王心想：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他马上请老人上车，和他一起回到都城。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

姜尚到了周国后，先被立为国师，这是当时最大的武官，后来升为国相，总管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姜太公果然是个栋梁之材，他做了周文王的国相后，帮助周文王整顿政治和军事，对内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征服各周边小国，开拓疆土，削弱商朝的力量，积极地为灭商大业做着准备工作。

姜尚认为只有破坏商王与各方诸侯的关系，使商王于孤立地位，才能取得成功。因而周文王积极争取盟国，各方诸侯也迫于纣王的一意孤行，国力江河日下而向文王靠拢，犬戎和密须一直是周后方的隐患，文王发动大兵征讨，灭亡了犬戎和密须，巩固了后方。然后，东渡黄河，灭黎、邶。崇侯虎为纣王的亲信，是纣王安置在西伯侯旁边的一颗钉子，并且崇国力强盛，城墙高厚。文王怀着两个目的发动了对崇的征伐：一是攻打崇，拔取这颗钉子，完成在西方的统一；二是试探纣王的态度。一场恶战爆发了，崇国防守严密，最后在使用了飞钩、临车、冲车后才拿下崇，值得庆幸的是纣王并没有出兵帮助崇国。这样周文王灭掉力量强大的崇，震撼了各小国。灭崇后，文王在渭水西岸建立了镐京。

文王由于多年征战，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临死前把武王托给姜尚。要姜尚忠心辅佐武王，加强力量，训练军队，争取盟国，等待时机发动灭商的战争。

文王没有来得及实现灭亡商朝的愿望就死去了，这副重担就落在了武王的肩上。武王在姜尚、周公旦、毕公等的辅佐下，君亲贤臣，臣下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君臣一心，把力量拧在一块儿。周在武王的治理下，继续向前发展，和商的决战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商朝已经很腐败了，商纣王终日饮酒作乐，荒淫无度，他强迫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时间，在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建了一座周长3公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楼观巍峨，亭阁秀丽，比夏桀的瑶台还要气派。他特别喜欢吃肉喝酒，便在宫院中挖了个大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这个

酒池很大，据说可以在里面行船。又在池边的树上挂上肉块，称作“肉林”。纣王和王公贵族们在“酒池肉林”中尽情享受。同时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实行残暴的统治，稍有冒犯便施之以酷刑，百姓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武王在即位的第2年就开始了行动。为了压服将士，行军途中始终带着文王的神主牌，表示自己是继承文王的意志。在出发前，他召集各大臣训话：“我的祖先对上天是有功的，因此，上天命令先王灭掉殷商，拯救万民。先王不幸早逝，但他将灭商重任托付给我的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大臣和大势已成的灭商大业，我一定要成先王未竟的事业。我会做到赏罚严明，还望你们努力，把先王灭商的愿望早日付诸实现！”姜尚作为军师也发表命令，“如有故意贻误战机的，立即斩首示众。”将士们士气高昂，决心追随武王完成灭商大业。在渡黄河时，一条白色鲤鱼跃入武王船中，殷人崇尚白色，武王认为这是吉兆，但鲤鱼带着鳞甲，好象又象征着商气数未尽，武王十分心忧。上岸后，一颗红色的流星划过长空，气势壮观，周人崇尚红色，这一下军心震动，更添勇气。周军长驱直入，各盟国军队赶到孟津与其会师，孟津会盟800诸侯，这充分显现了民心所向。各方诸侯纷纷请纣，但武王、姜尚都觉得灭商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商国内部虽然腐败，但到底还是个控制着众多诸侯国的大国，只靠周军是难以取得最终胜利的，若不能一举灭商，这不仅会大大损伤自己的力量，而且会动摇军心，引起盟国犹豫或离异。所以收兵回国继续加强准备，等待有利时机与商王决战。

武王即位的第4年，商朝的大臣或被杀或逃跑殆尽，国内动荡不安，国人反抗情绪极大，且商王刚发动过对夷族的战争，军力有所耗损，商王朝到了一触即溃的地步了。武王和姜尚意见一致，决定发动灭商大战。

周军由战车300辆，甲士45000人组成，声势浩大。在孟津再次会合诸侯，兵力大大加强，浩浩荡荡，直杀向朝歌，一路所向披靡。这年正值公元前1057年。

在2月甲子日的凌晨，天刚蒙蒙亮，武王率领军队来到朝歌郊外的牧野，举行誓师大会。武王手执象征权力的大钺和白旄旗，举行庄严的誓师典礼。武王说：“暴君纣王听信谗言，败坏朝纲，残害忠良，荼毒百姓，现在，我遵照上天的旨意来讨伐商纣了。所有参战的将士们，你们要勇猛向前，但不要杀害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以便使这些人对我们效劳。勇敢的将士们，作战有功的，将会得到奖赏；如果有谁不努力作战，我就会把他杀掉。前进吧！西方远道而来的战士们。”

誓师后，车辚辚，马萧萧，周军和各方诸侯的兵力达4000多乘，在牧野上展开攻势。

这时候，商纣王正带着他的宠妃和一帮大臣，在鹿台上欣赏歌舞，喝酒吃肉。周军进攻的消息传来，他才散了酒席，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应战。商朝的军队当时正在东南地区对付少数民族，一时抽不回来，纣王只好调集70万奴隶和俘虏编入军队，然后就向牧野进发了，一场恶战开始了。

战幕揭开了，姜尚率领一部分英勇善战的战士为先锋，杀入敌阵，姜尚勇猛异常，身先士卒。随后战车350辆，虎贲3000人，士卒23000人攻击过去。商王的军队都是不久前在对夷族的战争中掠夺过来的奴隶或俘虏，都巴不得商王战败，从而脱离这个暴虐的纣王，在周军向商军冲锋的紧要关头，商军前排的士兵们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商王的军队在阵前倒戈，使队伍大乱，70多万军队顿时土崩瓦解。

商纣王正在朝歌城中等待胜利的消息，突然听说商军大败，周军正向朝歌杀来。气急败坏的纣王，登上鹿台，望天兴叹，到死都想不到这都是由于自己平时作恶多端引起的，只认为是武王大逆不道，天意灭商。他不想让周军得到他的鹿台和珍宝，于是命人把宝石都集中到自己周围，放火自焚，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武王率领诸侯杀进朝歌，当他来到鹿台时，不禁大吃一惊，鹿台上的琼楼玉宇已成了一片瓦砾，未燃尽的巨梁大柱还冒着缕缕青烟。不一会儿，有人在灰烬中找到一具尸体，由于尸体四周堆着许多不易燃烧的珠宝玉器，所以尸体的相貌还依稀可辨，这正是商纣王。武王怒不可遏，向纣王的尸体连射三箭，然后砍下他的头挂在大旗杆上示众。武王终于推翻了商王朝，为祖父、哥哥及千千万万被纣王杀害的忠良报了仇，雪了恨。

第二天，武王被大臣簇拥着在社坛上祭天。庄严地宣布说：周灭掉了商朝，这是上天命令我来治理天下！

周朝在仪式上正式建立了，周武王自称天子。

武王宣布周朝建立了。这只是表明政权的名称确立了，并不表示周在统治上的建立，实际上，在东方有很多诸侯并不服从周的统治。因此，周的建立最早应当划在周公辅佐成王的统治稳固以后。

武王灭商以后，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建立周的统治，他召集姜尚、召公和周公进行讨论，共商办法。姜尚，是一位戎马倥偬的军事统帅，他从军事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罪恶深重的纣王统治下的殷民也一样罪恶深重，杀掉纣王后，就应该转向对殷民实行杀戮，快刀斩乱麻，免得夜长梦多，以后他们又起来造反，武王认为这不是办法。召公建议：杀掉反对我们的人，把没有反对我们的人留下来。这倒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但对应当怎样杀，怎样留的问题未置可否。武王又询问周公，周公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从较全面的角度提出办法：周人是小邦，人数不多，而殷商是大邦，人数比我们多得多。虽然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只要我们做得好，并不会反对我们，但殷商贵族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煽动。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进行矛盾转移，由周和殷的矛盾变成殷族内部的矛盾。我们让他们住原来的地方，不改变他们的地位，并且派一位殷的贵族对他们进行管理，当然我们必须加以监视。武王采取了这个办法。

武王把殷朝朝歌一带分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来管理商王朝的遗民。并派自己的弟弟蔡叔到上蔡一带，管叔到郑州一带的管地，霍叔到霍县一带，暗中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同时又为过去商王朝有名望的大臣平反，以慰藉商代贵族。把装疯的箕子放出监狱，其他一些被关的贵族也被释放。命令大臣闾夭到比干墓前去凭吊，并加修比干墓，以示对比干的尊敬。把忠臣商客住的地方修整一新，让他们住在那里。同时采取措施拉拢被征服的古老部族，大封五帝的后代，封神农的后代到焦、黄帝的后代到视、尧帝的后代到蓟、舜帝的后代到陈、大禹的后代到杞，使他们对周人感恩戴德，起到牵制殷遗民的作用。武王还散发鹿台的财富和巨桥仓库的粮食，使平民得到好处，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

周公向武王建议应该在伊、洛一带建立坚固的据点，起到连接东西的桥梁作用。武王采纳他的建议，营建洛邑。

在巩固周统治的过程中，周公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武王在牧野之战的第二年就病死了。临危前托孤于周公要他辅佐成王以成大业。周公为武王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于成王年幼，一切军国大事均由周公代理。

周公天资聪明，才华出众，从小在王室中长大，受过先王不少教诲，所以处理国政很是得心应手。但这引起管叔、蔡叔的不满，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独掌大权，将于成王不利。”周公一面更加勤恳地处理国家大事，一面恳切地对人解释。他向三朝元老召公、姜尚表白说：“我们祖先艰苦创业，才有今天，现在周的统治还不稳固，叛乱随时可能发生。成王年岁太小，天下人心中恐怕不服，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怎么对得起祖宗呢？我甘愿冒篡国的嫌疑代成王管理国政，希望你们支持我。”姜尚、召公等人被周公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不再怀疑他了，表明要支持周公。周公得到他们的支持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

纣王的儿子武庚不甘心商的灭亡，乘武王新死，成王年幼的时机发动叛乱，他拉拢蔡叔、管叔、霍叔，纠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原商朝的属国，气势汹汹起兵反周。周公果断地联合姜尚、召公进行东征，平定叛乱。经过3年艰苦的战争，东征终于取得胜利，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责成霍叔思过。接着他挥师向东，灭掉了东方各属国。周的实力开始向东方渗透，疆土大大扩展了。这次东征，挽救了周的命运，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使得周朝初年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东征胜利后，周公认为发生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周朝的首都太偏于西部，离从殷商那里得来的土地太远，所以决定把东都建在新营建的洛邑。从此周朝有了东西两个都城，原来的都城镐京称为宗周，表示那里是周朝祖宗营建的地方。新建的东都叫做成周，表示那里是周朝建成以后修建的。成王依旧在镐京居住，东都由周公坐镇。从此，周朝开始了长期稳定的局面。

周公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还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封建亲戚以藩屏国”，大封同姓兄弟、异姓亲戚，各有功大臣为诸侯，在全国建立统治据点。二、用安抚和镇压的办法控制东方。三、营建洛邑。四、区别对待各部落。通过周公的努力，周的统治终于稳固下来。周公死后，周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他葬在文王陵和武王陵附近，表示周公完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没能完成的事业。

西周东迁

在中国历史上，周王朝统治的时间最长，从建朝开国的武王，到亡国的幽王，共有 37 位君王，计 860 多年。

在公元前 12 世纪，武王率八百诸侯，讨伐暴虐的商纣王，灭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位于渭河平原上；周朝初年，周公辅佐成王、康王在位之时，国力最为强盛。周公东征后，修建东都洛邑以控制东方。此后，经穆王、厉王，国力已渐渐衰微下去了；尤其是到了周幽王在位时，他沉湎于女色，暴虐昏庸，甚于有千金买一笑的荒唐之举，致使众叛亲离，在申侯发动叛乱中被杀。其子继位，即平王，由于无法在西方立足，便迁到陪都洛邑，故而史称之为东周。周平王东迁是一件极富转折性的事件。从此，周王室失去了号令诸侯，控制天下的力量，因而各诸侯纷起，扩充力量，各自争霸。从此我国进入了动荡纷杂的时期。

周公在大规模东征过程中，认识到在伊、洛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中心的重要性，决心按照武王的遗愿大规模营建洛邑。在此之前，武王就想要在东部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中心以便于就近控制东方，但由于过早去逝，而未得以实现这一计划。

为了能得到祖先对营建洛邑的保佑，召公随从成王先到丰邑王的宗庙进行祷告，然后就出发去洛邑考察地形。召公在武王规划的基础上，在这里进行了一番实地测量，确定了修建宗庙、宫室的位置。召公又向老天爷进行了一番占卜，得到的兆象也很吉利，便回到镐京，把实地勘察结果报告给成王，成王很是满意，于是就派周公去洛邑进一步进行审查并负责监督修建新邑的任务。周公和召公利用商王朝的遗民作为劳动力，以及大批奴隶，在洛水旁边先修建了宗庙，又修建了宫殿，最后建了市肆，一座与西方的镐京遥相呼应的巨大的城市——洛邑修建起来了。洛邑成了西周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大批残存的商朝贵族被迁到洛邑，加以集中监视。

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即首都镐京和陪都洛邑。东都的洛邑成为宗周镐京的一道屏障和镇抚东部地区的一个重地。洛邑的兴建对于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周公死后，成王还一度把都城迁到成周，这也可能是之所以后来周平王东迁于洛邑的一个原因。

自穆王以后，经过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中间经过“共和”行政直到宣王、幽王在位，是西周王朝的中晚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奴隶制的母体内部逐渐产生了新的封建主义因素：经济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基础上，必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这就使周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愈来愈暴露出来了，在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平民的矛盾以及周王朝与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矛盾打击下，周王朝迅速衰败下去了。

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是厉王，他是夷王的儿子，名胡，在位 37 年。厉王不仅生活腐化，终日沉湎于酒色，而且生性贪婪，成天盘算着如何聚敛更多的财富以供挥霍。当时周朝的家底已经十分薄弱了，因为不时有外族入侵、诸侯国内乱，贡赋大为减少，王朝的国库变得很空虚。而周厉王又奢侈荒淫，挥金如土，结果周王朝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危机。

周厉王为了继续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决定增加赋税。这时，有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特别擅长横征暴敛，因此得到了厉王的重用赏识。

早在恭王时代起，一些“私田”就愈来愈多，土地国有被打开缺口。特

别是不少的山林藪泽，早已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还有些平民也常到河流湖泊里去打鱼捉蟹，或去山林里砍树采果，以使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顽固维护土地国有的荣夷公便建议厉王申明山林河湖里各种产品都归国王所有，成为周王朝“专利品”。于是厉王封山禁水，公开与民争利，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一些王室大臣也表示抗议。召公听见了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对厉王的种种议论，便跑到王宫去报告给厉王，厉王大怒，血腥镇压百姓的抗议，他派了很多密探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议论、咒骂厉王，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的满腹牢骚只好往肚子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一时间造成了一种奇怪现象——路上熟人相见时，也仅仅是使使眼色，表示对厉王的不满，而不敢多说话，这就是古书所说的“道路以目”。

厉王的苛政大大失去了民心，而且使其统治阶层内部也出现分化：一些贵族由于国王征收贡赋的严重，土地被兼并，也有些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沦为平民，壮大了“国人”的队伍。终于在公元前 841 年忍无可忍的愤怒的“国人”——包括平民和一部分贵族在宗周一哄而起，冲向王宫，赶走了厉王。

“国人暴动”使周王朝加在新生的封建主义萌芽头上的桎梏被粉碎了，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了贵族的“私田”。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开辟了道路，使西周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

“共和”行政 14 年间，废除了厉王时的一些弊政，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厉王儿子静长大成人，在公元前 827 年被请出继承王位，即历史上有名的“中兴西周”的宣王。他励精图治，使国内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一些诸侯也纷纷来宗周朝见，周王朝威望有所提高。他还起兵攻伐西北和南方的一些不服统治的少数民族部落，扩大了西周王朝的版图。但由于连年用兵，人力、物力消耗颇多，到宣王末年，西周王朝国势再度衰弱下去，“宣王中兴”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并不能挽救西周灭亡的命运，西周王朝正处于灭亡的前夜。

周宣王在位 49 年死去，他的儿子宫涅即位，这就是西周有名的昏愤腐朽的末代天子——周幽王。

幽王刚一继位，周王朝就相继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首先是宣王末年和幽王初年发生的旱灾，使全国的草木庄稼都枯死了，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去别处谋生；幽王二年首都镐京和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相继发生的旱灾和地震使周王朝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昏庸的周幽王对此却不闻不问，反而更加沉醉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之中。

幽王三年，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名叫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不久褒姒生了一个儿子叫伯服，于是幽王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太子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是幽王的王后。但后来，幽王得到褒姒，十分宠爱她，便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把褒姒立为王后，并以伯服为太子。申后遭此厄运，怕以后幽王还要加害宜臼，就让他去投奔外公以保全性命。于是宜臼便趁黑夜逃出镐京，投奔了申侯。

宜臼一走，幽王好象除掉了眼中钉，很是高兴，可是只有一件事不顺心，就是褒姒有个怪脾气，她从来不笑，不管多么有趣的事情，她都不露笑容，幽王觉得十分纳闷，便对褒姒说：“王后长得这样妩媚，若再开颜一笑，必然更加动人了。”褒姒淡淡地说道：“贱妾生来就不喜欢笑，大王不必见怪。”

幽王不信，下决心要让她笑一笑。于是他贴出告示：谁能让王后笑一笑，赏金一千。告示一贴出去，就有很多人争着进宫。有的吐舌头瞪眼睛做怪相，有的说一些无比荒诞的笑话，但是褒姒看了、听了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有个叫虢石父的大臣给幽王出了个主意，周幽王听了觉得可以试一试。一天，天气晴朗，幽王带着褒姒登上城楼，命人点燃烽火。原来古代交通不便，为及时报警，便在山顶上修建了许多高大的烽火台，上面储备了大批狼粪、火把之类的东西，并派士兵驻守。一有敌情，白天则点起狼粪，一缕白烟便直冲云天，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两座相邻的烽火台能互相看见。如果是晚上，就点燃柴草，靠火光传递情报。这样一座传一座，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便能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领部队赶来京城，听候调遣。果然，当狼烟升起，直冲云天的时候，远近的诸侯看到狼烟，纷纷集合兵马，向京城奔来。可是，当他们赶到京城时，却看不到一个敌兵，只见幽王和褒姒正坐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这下还真把褒姒给逗笑了。原来，众诸侯以为有外族在攻击京城，一路上全力行军，赶到时已经疲惫不堪，一个个十分狼狈。当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又没法发泄怒气，只好无可奈何地领兵往回走了。

褒姒在台上看见了各路诸侯受骗的狼狈之相，觉得十分开心，禁不住大笑起来。周幽王一看这个办法可以使她发笑，他又如法炮制了几次，结果诸侯们来的一次比一次少。终于，当幽王再燃起烽火时，根本就无人理睬了。这为西周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幽王为了剥削更多的财富供他享乐，于是提拔了“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主持政事，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这就更激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

这时，申侯便想乘机起兵讨伐周幽王。因为，被幽王废掉的申后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对此一直十分恼火。但他怕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于是又联合了犬戎族来攻打西周王朝。周幽王看到戎人真的打来了，被吓慌了手脚，连忙燃起烽火向各国诸侯报警求救，但是各国诸侯平时被幽王欺弄惯了，这次又以为是周幽王戏弄他们，所以没有一个诸侯派兵前来“勤王”。于是，镐京很容易地就被申侯和犬戎的联军给攻破了，周幽王带着褒姒仓惶出逃，结果在骊山脚下被戎人追上，周幽王被杀掉了，褒姒也成了戎人的掳获品。于是在公元前 771 年，西周王朝就灭亡了，繁华的镐京经过戎人的烧杀掠夺，变得残破不堪；周王朝聚敛的大批珠玉、财宝也被戎人席卷而去。

申侯看到周幽王被杀了，觉得大仇已报，便想起自己是周朝的臣子，不能让周朝的天下落入外族手中，于是又暗中派人去通知各诸侯国，请他们派兵来援救周王朝。各路大军星夜赶到镐京后，与戎人交战，结果戎人被击败，仓惶逃走了。

各国诸侯一看幽王已经死了，便与申侯商量，把原来的太子宜臼从申国请回，共同拥立他作周王朝天子，这就是周平王。

平王即位以后，戎人因为上了申侯的当，因此心中怨恨，经常出兵东侵，而周平王的兵力很有限，根本无法抵挡。加上镐京已残破不堪，如果要重新修建，此时的周王室已没有如此大的物力和财力、人力了，于是公元前 770 年，平王放弃了宗周，东迁到了周公营建的东都洛邑，因为镐京在西边，历史上便把平王以后的周朝叫做“东周”。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朝力量越来越小了。起初还控制了大约有 6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其中不少土地是被赏给了有功的诸侯。如郑国被赏赐在虎牢以东，郑统治者与商人立有盟约：商人不得离叛郑国的

统治阶级，而郑国的统治者不得强买商人的东西。他们相互合作，使经济得以发展。晋国也得到了一部分土地，使昔日“狐狸之所居，豺狼之所嗥”的荒凉土地逐渐开发出来。此外，还有一部分土地被诸侯侵夺，戎人占领，分封给王族或公卿大夫了。就这样，周天子自己所占有的土地民众，慢慢的就所剩无几了。

东周王朝建立后，王室力量已经极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各国诸侯也强大起来，不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周天子已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宗主”。而各国诸侯之间，强并弱、大凌小，齐、楚、秦、晋开始强大起来。自此，我国历史进入了“政由方伯”的大动乱时期——春秋时期。

平王东迁标志着奴隶制度经夏、商之后，在西周达到昌盛后，开始衰落下去，一种新的制度——封建制度正在萌动中。

